

中国外交面临命运共同体中的竞争

——对《打造中国外交改革创新的机制》的评述

崔立如*

这一届清华安全论坛具有里程碑意义，今天发布了《打造中国外交改革创新的机制》倡议的报告。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提出了外交改革问题。报告中所讲的“外交转型”，也是最近两三年国内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报告吸收了一些国内讨论的思想，但首先值得肯定的是这个报告开创了一个“第一”，就是敢于打破“一成不变”。

我们有许多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改革开放，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打破这些“一成不变”。这些年中国的外交也在发展，政策有调整，也有变化，但正如阎学通教授所讲的，确实还有许多东西是一成不变的，这在外交上形成了一个突出的特点。国内的改革越来越深入，许多“不变”被逐渐打破了，但在外交领域，大家的思想中还是有许多禁锢的。这个报告作为一个公开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观念、思想和建议，不论其正确与否，如何做价值判断，仅这种“敢为人先”的行动，首先就值得赞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已经讲了许多年，用陈云的话说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但我们“唯上”的风气到现在并没有完全扭转。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对中国外交的讨论，经常有“唯上”的思想在作祟，甚至我们一些正式文件讲话里都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说法被最高领导人确定下来以后，往往就成为不能改变的固定用语（套话）。但形

* 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电子信箱：cuiliru@sina.com。

势发展了，原来的固定用语不适应了，于是我们就创造了一种变通办法，使套语继续用，但宣称其“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变化”。严格来说，这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词语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这个词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我认为这样做是因为有“唯上”的思想在作怪。

改革开放要一步一步来，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这是中国的现实，因此我们不能急于求成，冒进往往会适得其反。但对存在的问题，我们也要有所认识，这个报告能以公开的形式推出外交改革建议，它与内部讨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作为开创新风之举，我觉得就更显其重要意义。这里面提出了新的观念，谈到我们的外交应该怎样考虑顶层设计，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改革措施，都是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第二，报告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有相当一部分是可圈可点的。比如说“共同体”的思想，虽然不是新创的提法，但是这两年，特别是今年（2014年）以来，作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推崇的思想提出来，我觉得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讲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形势变化，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改变了以往世界政治的某些范式。“共同体”的思想开始热起来。这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也有一定关系，国际关系理论和国家政策是两个概念，但它们之间有联系。国际关系理论或是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归纳而成，或是推演而成。实践的发展会推动理论的发展，可以说，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变化。外交政策是要应对正在发生的事情，需要参考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解读，相关的理论对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好的政策还具有前瞻性，可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再做一定的推演。具有大战略思想的外交政策要对大趋势进行判断。如果我们的政策有创造性，对趋势判断准确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些超前的设计，这对取得外交主动是非常有利的。但对趋势如何能做出准确判断呢？对过去的实证研究进行总结、归纳、演绎所产生的思想和理论是重要的参考。共同体的思想对未来的中国外交有重大意义。

第三, 报告中有一些具体的工作建议, 总体上讲是积极进取的, 值得有关部门参考。

首先, 在思想观念方面, 我觉得突出的一点就是“共同体”的思想, 还有“和平竞争”论。这个思想提出的逻辑是成立的。不论是美国、中国、印度,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一个外交理念和外交思想, 引领整个外交大的发展方向和设计, 这是非常必要的。在现阶段, 提出“和平竞争”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它的依据就是现在是和平发展的时代。和平发展时代的提出, 就是因为战争的可能性被降到历史的最低点。其中的原因, 这里就不展开说。实际上, 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几百年来就是在战争与和平两种状态中转换的。二战以后没有发生世界大战, 这是不容低估的发展变化, 今后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低。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确定了“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的主题。也就是根据这一思想, 我们才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下决心进行改革开放, 否则, 国际环境是否具备条件就是个问题。

在 21 世纪的今天, 提出“和平竞争”, 可以认为是这一思想的继续。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说, “竞争”对中国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概念。中华文明成熟得太早 (这是梁漱溟的看法, 我很接受这个看法), 是高居于其他国家之上的, 经济和政治长期都具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性。优越的东西往往就会固化下来, 结果固化了 2000 多年。尽管中国有变化、有进步, 但总体上是固化的。汉代以后中国文化的正统基本上是儒家思想, 也有道家的影响, 后来还引进了改造了的佛教。这三个都有很重要的一个缺失。这对中国文化来说, 也许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并不一定是坏事。但是, 后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缓慢让我们看到了它的问题, 尤其是中国被带入国际角逐后, 它与西方国家比较就显现“相形见绌”的问题。这就是“竞争”的缺失。

我们今天认识到, 竞争实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进行改革开放, 建立市场经济,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发展竞争机制。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 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发展变化。那

么，在当今时代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竞争？将国家间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竞争作为一种具有时代精神的外交思想提出来，对正在迅猛崛起的中国是很有意义的。我国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背后，实际上就是和平竞争的思想。对此，作为呼应，美国方面提出“非零和模式竞争”“健康的竞争”等，至少反映了它对和平竞争思想的正当性和进步性的不可拒绝，这对于指导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思想观念上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尽管和平竞争的话语不是全新的（过去赫鲁晓夫提出过“和平竞赛”），但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它代表了新的时代精神，特别是对新时期的中国的大国外交而言。

其次，报告中的有些概念可能还要做得精深一些。比如，将“不结盟”与“命运共同体”做一个对应，实际是说原来我们的不结盟政策要与时俱进，所以才提出一个命运共同体，但它们本身就不是两个对应的概念。我猜想，学通老师的本意是主张结盟政策的，但可能因为反对的意见较多，所以搞了一个“曲线救国”，提出“命运共同体”。中国之所以坚持不结盟，是基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现实和中国的基本外交理念。学通老师的意思是，我们面对的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同时它又有一个很强的同盟体系。如果中国一家单打独斗，基于实力上、影响力上的差距，会要吃亏，所以要尽量调动更多的力量。报告里用了“铁杆朋友”之类的词，我觉得现在还是不适合用交“铁杆朋友”的思路来指导外交。我觉得这个不太靠谱。实际上，只有少数国家出于特殊的原因愿意当你的“铁杆朋友”，而且是死活靠上你了。绝大多数国家是要搞平衡外交。比如，像缅甸这样的国家，一度十分依靠我们，但当它的需要有所改变，就立刻移向中间路线，要两边都靠，都得好处。这是以后中国周边国家的一个基本趋势。想把缅甸这样的国家变成“铁杆朋友”，可能有些理想化。因此，我是赞成坚持不结盟政策的。我们有自身的一些独特的条件，可以延续我们的不结盟政策。

最后，再说一说报告中提到的民族复兴。报告中讲民族复兴是作为大国的中国特有的、唯一的国家目标，这使我们的外交有了民族复兴的使

命。对民族复兴，我们要进行必要的解读。我们在讨论问题时对一些概念的使用经常过于宽泛或过于灵活，因此在进行政策讨论时，就容易产生不清晰、不太容易定位的问题。我认为，民族复兴的实质是国家的现代化，这也是中国梦的实质。在以往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民族复兴的含义，一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实现自强的目标；二是中国在上世界上地位的提高，即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我们同时还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当然，这是一个十分长远的目标。然而，从和谐世界的理念讲，最终目标就不是一个“国家强势”的问题了，它是一个“国家之间和谐相处”的问题。如果大家都要做强势国家的话，这个和谐从何而来？中国的强国目标需要用“王道”的思想来解读，成为强国的重要性在于其作为实现和谐世界最终目标的必要途径。从“强国”到“和谐”是一个过渡。如果你要倡导一种进步的、对全人类都有好处的东西，那你必须首先实现自身的强大，之后才能起主导作用。就像我们有的企业家做大以后再搞慈善一样，你没有做大，有什么能力、拿什么资本去搞慈善？所以，中国要成为强国，是在一个过渡时期的必须，尤其是在现实主义当道的现实世界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博弈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最终目标和过渡的现实需要的中国逻辑，必然要面临两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一是如何保证中国在实现国家强盛目标的过程中避免强权政策倾向；二是如何能使他国相信一个强大的中国将肯定不会是一个霸权国家。而要对这两个问题给出正面解答的必要条件，首先是中国人自己真正相信上述的“强国梦”和建设“和谐世界”的中国逻辑，之后是由内到外一步步解决实行“王道”所要求的“做好自己”的问题。这也是报告提出的中国外交改革创新任务所不能不思考的大问题。